

现代中国 人的诞生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



陈向阳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014036609

K250.7
59

现代中国八时地工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

陈向阳 著



K250.7
59



北航

C1723478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中国人的诞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 /
陈向阳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60-6960-2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史—研究—中国—
19世纪~20世纪 IV. ①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6698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孙虹 夏显夫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王越

书 名	现代中国人的诞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 XIANDAI ZHONGGUOREN DE DANSHENG: CONG 19 SHIJI ZHONGYE DAO 20 SHIJI ZHONGY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25 1插页
字 数	400,000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缘起 / 1

发凡 / 4

一、何谓现代中国人 / 4

二、现代化：现代中国人诞生的温床 / 13

三、现代中国人的孕育与诞生 / 18

四、本书框架与写作思路 / 21

壹 现代经济人的诞生——从自业人到职业人 / 23

一、何谓自业人？何谓职业人？ / 23

二、自业人：古代中国经济人面相 / 24

三、现代化与职业化 / 27

四、晚清民国现代职业人谱系 / 32

貳 现代社会人的诞生——从家族人到组织人 / 87

一、何谓家族人？何谓组织人？ / 87

二、家族人：古代中国社会人面相 / 88

三、现代化与组织化 / 92

四、晚清民国现代组织人群像 / 98

叁 现代精神人的诞生——从迷信人到理性人 / 151

一、何谓迷信人？何谓理性人？ / 151

二、迷信人：古代中国精神人面相 / 153

三、现代化与理性化 / 160

四、晚清民国现代理性人透视 / 166

肆	现代行为人的诞生——从礼性人到自由人 / 211
一、	何谓礼性人? 何谓自由人? / 212
二、	礼性人: 古代中国行为人人面相 / 213
三、	现代化与自由化 / 221
四、	晚清民国现代自由人素描 / 226
伍	现代社区人的诞生——从乡式人到城式人 / 283
一、	何谓乡式人? 何谓城式人? / 284
二、	乡式人: 古代中国社区人人面相 / 287
三、	现代化与城式化 / 293
四、	晚清民国现代城式人脸谱 / 297
陆	现代性别人的诞生——从等差人到平权人 / 326
一、	何谓等差人? 何谓平权人? / 327
二、	等差人: 古代中国性别人面相 / 327
三、	现代化与平权化 / 337
四、	晚清民国现代平权人勾勒 / 364
结语	现代中国人的诞生——从臣民到公民 / 378
一、	公民概念的流行 / 378
二、	公民社会的塑铸 / 380
三、	公民制度的创立 / 384

征引文献 / 387

后记 / 412

缘 起

五年前，拙著《现代中国的兴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有幸面世。现在，作为该书的姊妹篇——《现代中国人的诞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也即将付梓。旧作重在研究近世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新著则以近世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为主旨。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犹如现代化的两翼，比翼齐飞，缺一不可。新旧两书侧重不同，相辅相成，意在更全面地揭示近世中国现代化的面貌和成就。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近世中国现代化问题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方面，从社会背景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中断多年的现代化重新启航。表现在经济现代化一马当先，政治现代化开始破冰，媒体言论逐步放宽，学术界再现自由争鸣，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更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和他山之石，整个社会洋溢着一股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浓烈氛围。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激发了我的寻思和追问：现代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既往现代化的叩问。何况我出身历史专业，从事历史教学工作，除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还有一种强烈的专业感和职业感驱使我义无反顾地探究中国现代化的来龙去脉。虽然毕业留校后前十年从事的是考古通论的教学工作，但在工作之余，我逐渐把精力转移到现代化问题上来。直到90年代初，随着工作单位、从事专业和居住城市的变动，终于实现了自己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转移。

另一方面，就学术背景而言，当时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晚清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史料、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观点。如围绕“两半论”和“两半化”、“资本主义化”、“近代化”等有关近世中国社会变迁问题的探讨就是热点之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有关近世中国现代化（当时大多表述为“近代化”）问题的研究热潮。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现代化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对近世中国的看法和评价，推动了近史研究逐步回归真实和走 1



向理性。受益于当时学术界宽松气氛的熏陶，获益于学术界多年研究成果的启发，加上自己长期对现实生活中现代化问题的强烈关注，我开始思考和研究近世中国现代化问题，并把它确定为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

然而，无庸讳言，当今有关近世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成绩固然很大，但不足和缺陷也十分明显。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的偏颇和失衡。从宏观层面看，如果说现代化研究包括社会现代化研究和人的现代化研究两大部分，那么，考察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有关近世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研究相对活跃和多产，有关近世中国人的现代化研究则相对沉闷和薄弱，呈现出明显的跛足情形。如多部近世中国现代化史通论性著作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见事不见人或多见事少见人，缺乏对人的现代化和现代人的研究。在人的现代化史研究中同样存在明显的跛足，即侧重人的精神属性现代化研究，忽略或轻视人的其他属性现代化的研究。就是说，重社会现代化而轻人的现代化、重人的精神属性现代化而轻人的其他属性现代化。这两个一重一轻正是目前有关近世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实际状况，至少从宏观和总体的研究成果看可以作如是观。显然，加强近世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加强人的其他属性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是完善和深化近世中国现代化研究和人的现代化研究的当务之急。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就是这样一种抛砖引玉式的尝试。

回首自己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之路，先是从近世中国组织现代化问题的个案研究起步，代表作有论著《晚清京师同文馆组织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继而拓展到近世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代表作是《现代中国的兴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进而向近世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推进，代表作就是这本即将付梓的《现代中国人的诞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按照自己的主观构想，如果条件允许，计划再写作一本有关近世中国组织现代化问题的总论性著作，从而搭建起包括现代中国社会的兴起、现代中国人的诞生、现代中国组织的建构等三部专著在内的“现代中国”史著三部曲系列。

多年来，作者一直致力于有关近世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的史料爬梳和知识积累，并较早展开了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框架建构工作。早在1995年就发表了《人的全面现代化刍议》（载《华南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年第 4 期)一文,针对学术界普遍把人的现代化理解为单一的精神人的现代化或素质现代化的观点表达了异议,独创性地提出了“人的全面现代化”的概念、命题和观点,认为人的现代化研究应立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变迁,从经济人、社会人和精神人三个维度全面研究人的现代化,研究人的全面现代化。本书的框架结构就是以上述分析框架为基础,并作了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增加了行为人、社区人、性别人的分析维度,以期更完整、更全面地认识和研究近世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不仅是作者有关近世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延续和深化,也是对作者自己早年提出的“人的全面现代化”理论命题或假说的一次历史验证。



发 凡

现代中国人是怎样诞生的？或者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是怎样从“古代人”走向“现代人”的？本书尝试“复原”或“重建”这一历史过程，并请您一起“重走”过去百年的人的现代化之路。在展开这一工作之前，先介绍本书的基本概念、写作要旨和逻辑思路，并对现代中国人诞生的时代背景和基本过程略作交代，或许不无裨益。

一、何谓现代中国人

所谓“现代中国人”，乃是与“古代中国人”比较而言。那么，何谓“现代中国人”？何谓“古代中国人”？进而言之，何谓“现代人”？何谓“古代人”？二者划分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划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方法问题，不妨先从这个问题谈起。

（一）如何划分古代人和现代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古代人、现代人这样的概念。那么，古代人与现代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划分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人和现代人的面貌和特征，都有自己的划分标准。但古代人与现代人之所以有别，关键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人的本质属性就成为划分古代人和现代人最基本的标准。

然而，学术界目前对有关古代人和现代人划分标准和本质差别问题的专门讨论并不多见，对“古代人”、“现代人”的概念内涵似乎也缺乏明确认识和确切界定。在史学领域，“古代人”、“现代人”甚至很少作为正式和规范的学术概念使用。但学术界对于从古代人到现代人的转化即“人的现代化”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不妨以此为切入点，

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标准和方法。

考察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当下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基本集中于“精神人”现代化这个侧面。换句话说，人们主要是以人的精神属性为标准来认识和划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无论是对古代中国人（或“传统”中国人）的分析，还是对现代中国人（或“近代”中国人）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人的心理、素质、思想、意识、道德、修养、性格、气质等精神属性方面的特征及其变迁。从“五四”时期有关中（东）西文化比较和国民性问题的论争，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类似讨论，莫不如此。笔者把这种人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称为“精神分析法”，把这种依据人的精神属性划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标准称为“精神标准”。

如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从国外引进的有关人的现代化理论就极大地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其中尤以美国学者阿列克斯·英格尔斯和戴维·H·史密斯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影响较大。该书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以人的综合素质为中心，从24个个人素质的现代性维度，研究了人的素质现代化问题。正如作者在书中所称，“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哪种人才是现代人。我们凭什么标志判断他是现代人？”“从一开始，我们就从一个假设出发，即没有一项单一的素质就可以恰当地限定现代人。我们相信个人的现代性可以、并且通常也应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中表现出来。换言之，我们认为它是很多素质的综合体或复杂结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最后，我们提出24个个人现代性的维度做为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我们最终把这些主要的主题系列都纳入对现代人的测量之中。”^① 这里所体现和使用的方法基本上属于“精神分析法”，划分标准就是“精神标准”。这种研究模式对国内后来的人的现代化研究影响很深，可以说至今都未能跳出其窠臼。

在国内，多部有代表性的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专著也大体把人的现代理解解为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或素质的现代化。如《中国人的现代

^①（美）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化》一书认为，“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个有既定运行目标、多层次、多因子、开放型的动态发展系统，它以现代社会环境更新进步为互动性背景，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导向，以人的素质、潜能开发为动力基础，以现代生活方式、生活质量进步为主要景观特征，以人的社会心理、观念进步为内核，以人的个性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①通观全书内容，研究范围虽有所拓展，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心理、素质为主要目标和研究视角的“精神分析法”研究蓝本，采用的标准基本上也是“精神标准”，确切地说是一部较有特色的研究中国精神人现代化的专著。

“精神分析法”和“精神标准”的特点及优势在于强调和紧扣人最本质的属性——精神属性的现代化，缺点是过分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和唯一性，并以精神属性掩盖和取代了人的其他属性，成为一种“唯精神”论，终究是一种片面、局部、单一的研究方法和单一标准。用这种方法和标准观照古代人和现代人，可能获得这样的印象：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似乎只存在精神属性的区别和变化，其他本质属性几乎没有变化和差异。或者说，即使有差异和变化也无足轻重。

众所周知，人的本质属性包括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就是说，人不仅是精神人，还是自然人、经济人和社会人。因此，对人的现代化的研究，对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研究，就应从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和精神人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此外，人除了具有若干本质属性，还具有一系列非本质属性或特殊属性，如实践属性（具体表现为行为属性）、空间属性（具体表现为社区属性）、性别属性等，这些也是考察不同时代人的差异与变化的重要依据和视角。基于此，笔者尝试超越流行至今并一统天下的“精神分析法”这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和“精神标准”这种单一标准，在本人早年业已提出的从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方面研究人的全面现代化问题的

^① 叶南客著：《中国人的现代化》，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年，第30—31

观点基础上,^① 进一步提出一个包括人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行为属性、社区属性、性别属性等六大属性在内的“综合分析法”和“综合标准”,用以研究人的历史变迁问题和人的现代化问题。即从经济人、社会人、精神人、行为人、社区人和性别人六个方面展开对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分析,进而展开对近世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② 从精神分析法转向综合分析法,从单一精神标准转向综合标准,这样或许能使我们更完整、全面、本质地认识与划分古代人和现代人。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就是根据这种理论和方法搭建的。在具体讨论现代中国人问题之前,我们先尝试运用综合分析法和综合标准,一窥古代中国人的“长相”。

(二) 古代中国人的“长相”

古代中国人是现代中国人的前身,也是现代中国人的“参照系”。现代中国人是对古代中国人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只有认识了古代中国人的基本特征和面貌,才能通过比较和对照,揭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特征和变化。那么,古代中国人的“长相”究竟是怎样的?

这里我们尝试运用综合分析法和综合标准,从经济人、社会人、精神人、行为人、社区人、性别人六个侧面揭示或“复原”古代中国人的面貌。可以说,从不同侧面观察,古代中国人的“长相”各不相同。首先,从经济人侧面看,古代中国人多属“自业人”。所谓自业人,是作者“杜撰”的一个新概念,指在家庭或家族内部主要从事各种自给自足性、非社会性、非市场性、非商品性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从业人员,以区别于具有高度社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特征的“职业人”。即以家庭或家族自我生产、自我使用为主,绝大部分产品不会成为商品,不流入市场。以此观之,古代中国人的从业状态大多是自业而非职业。以往人们把这种自业性质的从业活动纳入“职业”范畴,把古代自业现象看作职业现象,把古代自业人视为职业人,这种观点

^① 陈向阳:《人的全面现代化刍议》,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②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人的自然属性极少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人类的体质从大约一万年前的开始,就已成为体质学上的“现代人”。因此,对“自然人”的讨论在此从略。



值得商榷。愚以为，职业与自业是人类历史上两种主要的从业形式，是两个既有一定联系和相似性但又具有完全不同本质内涵的概念。职业本质上是一种完全社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营业活动，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与外部社会进行交换和互动的经常性、持续性的从业活动。而自业恰好相反，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特征。如果说自业人的从业活动具有自给性、自足性、封闭性、固定性、狭隘性、亲缘性、非社会性、非市场性和非商业性等特征，职业人的从业活动特征则主要表现为交换性、营利性、开放性、流动性、广泛性、业缘性、社会性、市场性和商业性。当然，古代社会并非没有职业，只是职业不如自业发达、普遍和强势罢了。实际上，中国古代末期已出现一定的职业化苗头，但终古之世，中国社会依然是自业人的汪洋大海。因此，我们说古代中国经济人本质上是自业人。

其次，就社会人侧面而言，古代中国人拥有一张典型的“家族人”脸谱。所谓家族人，就是指以家族（包括家庭和宗族）为主要活动场所、关系形态、交往方式、群体形式和生活空间的人群，从而区别于那些以专业化组织为主要活动场所、关系形态、交往方式、群体形式和生活空间的“组织人”。古代中国人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定居到迁徙、从摇篮到坟墓、从先祖到后世，无不生活在极其浓厚的家族氛围和环抱中，离开了家族几乎寸步难行。人们的观念也是家族至上，唯此为大。而且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组织也充满了浓厚的家族化色彩。如同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历史的长期连续性和社会的高度同质性，世界上恐怕也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家族化程度可与中国古代相比。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朦胧的组织化萌芽，但家族人这棵参天大树迄未撼动。因此，古代中国社会人本质上属于家族人。

再次，从精神人侧面入视，古代中国人具有一幅“迷信人”面孔。本书所谓迷信人，是指那些缺乏主体意识、自由理念、人本观念、科学态度、批判精神和自主能力，对某种事物因迷失理性而盲目信奉的人，以区别于那种具有高度主体、开放、自由、科学、人本、批判和自主精神的“理性人”。在中国古代，由于专制政治的控制、礼治制度的束缚、手工技术的制约、小农经济的局限、商品经济的羸弱、交通通讯的封闭、科学精神的稀薄、大众媒体的匮乏、人本观念的缺失、思维方式的僵滞等原因，人们的科学化和人本化水平即理性化程度普遍不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终古之世，愚昧无知、愚忠盲从、崇天

拜神、听天由命始终是中国古代精神人的普遍特征。而求真、实证、怀疑、客观、批判、反思和独立的精神始终没有成为民众普遍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长期以来，在愚民政策的控制和熏陶下，形成了社会普遍对上天、鬼神、君权、祖宗、经典、偶像以及教条的绝对迷信和盲从。古代中国人的一生一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由迷信主导和相伴。因此，古代中国精神人本质上属于迷信人。

再次，就行为侧面观察，古代中国人非“礼性人”莫属。本书所称的礼性人，是指那种完全以“礼”为最高行为准则并被剥夺了大部分自由权利的人，以区别于那种个人权利受到法律制度承认和保护的“自由人”。在中国古代，这种“礼”就是以周礼为原型、以三纲五常为皈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伦理道德为包装、以绝对的等级制和身份制为特征、以君主专制为根本、以不平等为实质内涵的制度规范，并以此规定了君民、君臣、官民、男女、父子、夫妻、兄弟、长幼、上下、尊卑等一切社会关系的绝对不平等，整个社会和所有的人无时无刻无不浸淫在这种严格等级化的“礼”之中。具体而言，从纵向看，古代中国人从出生到成长、从学习到工作、从成年到结婚、从衰老到死亡，一切行为和活动都要严格按照“礼”的标准和规定进行；从横向看，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进行各种交往，建立各种联系，都必须严格按照礼的标准和规范实施。总之，古代中国人的吃穿住行、迎来送往、从学就业、生死行止等等，都必须以礼为价值皈依、行动指南和评价标准。概括起来，就是要求人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行。因此，古代中国行为人本质上是礼性人。

继而，从社区人侧面看去，古代中国人的面目是“乡式人”，以区别于现代“城式人”。乡式人和城式人是作者“杜撰”的一对概念。所谓乡式人，这里是指那些不仅以乡村为居住社区而且保持了古老乡村社会特有的聚落分散、天成自然、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家族聚居、亲缘交往、关系简单、足不出户、相对保守、静止凝固、熟人社会、礼俗人情等特征和生活方式的人，简称乡式人，以与那些居住在城市社区、体现城市生活方式的城式人相区别。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社区人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乡式人。即使很多居住在城市的人，也大多保留了乡式人的生活方式。

最后，就性别人侧面而言，古代中国人是典型的“等差人”。笔者所谓“等差人”，这里特指男女两性之间具有明显高低地位等级和权利 9



差别的人，以区别于男女权利地位平等的“平权人”。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男女不平等现象十分普遍，也极其严重，而且绵延久远。男性具有种种特权，女性的很多权利被剥夺或受到限制，并高度依附于男性。因此，古代中国性别人本质上是男女不平等的等差人。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人的“长相”是自业人、家族人、迷信人、礼性人、乡式人和等差人的综合和统一。从根本上说，这一“长相”是由古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技术形态是手工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社会，文化形态是相对禁闭社会，观念形态是相对愚昧社会，制度形态是人治社会，政治形态是专制社会，由此决定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古代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长期未变，致使古代中国人的“长相”也始终未变，或者说基本没变。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在现代化的推动下，随着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变革，中国的社会面貌开始发生根本改变，中国人的长相也开始“变脸”，呈现出新的面孔和新的形象，从“古代人”逐步演变为“现代人”。

（三）现代中国人的“面孔”

与古代中国人的“长相”不同，现代中国人的“面孔”几乎焕然一新。大约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尤其是伴随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重大转型，社会技术形态从手工社会逐步转型为机器社会，社会经济形态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社会文化形态从相对禁闭社会逐步转型为自由社会，社会观念形态从相对愚昧社会逐步转型为理性社会，社会制度形态逐步从人治社会转型为法治社会，社会政治形态逐渐从专制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型，近世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根本变革，从古代社会逐步演变为现代社会。社会面貌的改变极大地改变了人的面貌。以自业人、家族人、迷信人、礼性人、乡式人、等差人为特征的古代人形象开始褪色，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人、组织人、理性人、自由人、城式人、平权人为特征的现代人的新形象和新面孔。当然，这个“变脸”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演变和推进的，各种新形象的成长速度和程度也参差不齐。如果说 19 世纪中叶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开端，是现代中国人诞生的起点，到 20 世纪中叶，经过大

具体而言，从经济人侧面看，近世中国人开始从“自业人”走向“职业人”。所谓职业人，就是指那些专门从事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营利和谋生活动的从业人员，以与自业人相区别。从19世纪中叶起，伴随职业化和职业现代化的兴起，人们的从业状况开始发生如下重大变化：一是大量自业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即从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业，走向从事商品化、市场化甚至国际化的农业生产；二是大量自业农民兼小手工业者转变为职业手工业工人；三是大量自业农民、小手工业者、职业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市民转变为机器工厂的职业工人；四是大量自业农民和城市市民转变为城市中的各类职业服务人员，包括车夫、挑夫、司机、保姆、店员、跑街、伙夫、理发师等；五是各种现代组织机构出现了大量职员；六是出现了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医师、记者、编辑、作家、教师等大量“自由职业者”。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变迁，职业人逐步取代自业人成为近世中国经济人的新面孔。

就社会人侧面而言，近世中国人开始从“家族人”走向“组织人”。所谓组织人，就是指那些以各种组织为主要活动空间、交往场所、关系媒介、群体形式和职业机构的人，以与家族人相区别。从晚清开始，伴随组织化和组织现代化的兴起，出现了大量现代组织，如兵工厂、钢铁厂、造船厂、机器厂、纺织厂、化工厂、火柴厂、面粉厂等各类工厂组织；贸易公司、矿务公司、工业公司、轮船公司、铁路公司、公路公司、航空公司、百货公司、保险公司、垦殖公司、畜牧公司、林业公司、园艺公司等各种公司组织；银行、证券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等各种现代金融组织；大学、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女子学校、补习学校等各种现代学校组织；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通讯社、电台等各种现代媒体组织；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教育馆等各种现代大众文化组织；国会、议会、政府各部厅处科股、陆军、海军、空军等各种现代军政组织；政党、学会、联合会、协会等各种现代社团组织；还有法院、医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农场等其他各种专业组织和中介组织。人们纷纷走出家庭、家族和宗族，走向社会，走向组织，成为工厂人、公司人、银行人、学校人、报人、出版人、医院人、议会人、军队人、政党人、社团人等。不过百来年，组织人日益取代家族人成为近世中国社会人的新面孔。

从精神人侧面考察，近世中国人开始从“迷信人”走向“理性 11



人”。所谓理性人，就是指那些具有开放、科学、民主、自由、独立、平等、人权、批判、自主意识和精神的人，以与迷信人相区别。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开放格局逐步形成，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过去狂妄自大和自我封闭的天朝意识、华夷观念逐渐让位于现代平等和理性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际意识和外交意识。中国人开始走向开放人；现代学校的设立和现代课程的开设，各种现代媒体的兴办，各种现代文化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创立，不仅使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农业、矿业、工业、交通、商业、法律、经济、教育、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各种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获得广泛传播，而且使现代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也获得广泛传播，大大促进了国人的科学化和知识化，中国人开始走向科学人；与此同时，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民等现代思想观念也获得广泛传播，中国人开始走向权利人。走向开放人、科学人和权利人概括起来就是走向理性人。百年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理性人日益取代迷信人成为近世中国精神人的新面孔。

再看行为人侧面，近世中国人开始从“礼性人”走向“自由人”。所谓自由人，是指在现代法律和宪法的规范和保护下，人的尊严、人格、个性和权利受到充分尊重和平等待遇的人，以与礼性人相区别。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国人开始挣脱礼的束缚，获得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包括经营自由、投资自由、交易自由、财产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交往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罢工自由、请愿自由、游行自由、集会自由、写作自由、选举自由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高度。而且人们已敢于公开追求各种自由，敢于公开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认同。到20世纪40年代，自由人日益取代礼性人成为近世中国行为人的新面孔。

从社区人侧面入视，近世中国人开始从“乡式人”走向“城式人”。所谓城式人，是指认同、接受和采纳城市生活方式的人，以与乡式人相区别。城市生活方式具有集聚密、节奏快、交往广、活动多、关系杂、变化频、机会多、效率高、非农化、时尚新潮、异质性强、